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中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林语堂 / 著

王海 何洪亮 / 主译

王海 刘家林 / 校

中



新闻
舆论史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 / 著

王海 / 何洪亮 / 主译

王海 / 刘家林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舆论史/林语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09189-1

- I. 中…
- II. ①林…②王…③王…
-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
-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6846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 著

王海 何洪亮 主译

王海 刘家林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3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地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

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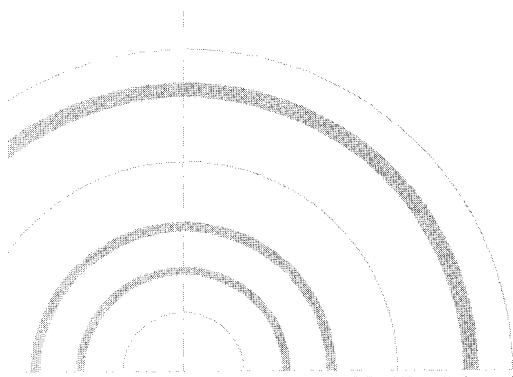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 and 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中文版序言

林语堂(1895.10.10—1976.3.2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传播学及舆论史学家。从1932年起,林语堂先后创办及主编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著名刊物,影响巨大。1936年,他出版了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of China*,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该书是我国现代早期为数不多的几部用英文写的有关新闻学、舆论学、宣传学著作中的一部,其他类似著作还有名记者赵敏恒所著《外人在华报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R. S. Britton,一作白瑞登)所著《中国的报刊: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上海,别发洋行,1933年)。白瑞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参考了一百多种中英文论著,下了很大工夫,是研究中国

早期报业及外国人在华创办报业的重要著作。林语堂在写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时对该书也多有援引。

林语堂之所以能写出《中国新闻舆论史》这样的专著，是与他早年长期从事新闻及报刊活动的经历分不开的。

林语堂很早就开始从事新闻及报刊事业。1916年秋，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便由校方举荐到北京清华学校担任英文教员，直到1919年。其间，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这是他与报刊结缘的开端。

1919年秋，林语堂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专攻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因经济发生困难，1921年林语堂离美赴法，后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他获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结束了4年留学生活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并从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镌》撰稿，“发表一些汉语古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的译作”^①。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在《晨报副镌》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载《晨报副镌》，1924-05-23），另一篇是《幽默杂话》（载《晨报副镌》，1924-06-09）。特别是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他最早将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从此以后，提倡小品文、提倡“幽默”，便成为林语堂的招牌口号。

1924年11月，由鲁迅支持的综合性周刊《语丝》在北京创刊，林语堂被邀约为该刊长期撰稿人，同时还在《京报副刊》及其专刊《莽原》上发表文章。

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逢每月初一、十六出版，由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承担出版发行工作。林语堂一直为《论语》首篇专栏“我的话”撰稿。

《论语》从1932年9月16日创刊，直到1937年8月1日出至第117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1946年11月复刊，直到1949年5月停刊，又先后出版177期。《论语》前后加起来共出版294期，是中

^① 张梁：《林语堂》，转引自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2卷，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国现代著名的寿命较长的刊物之一。其主编者除林语堂外，还有郁达夫、邵洵美、陶亢德等。

1934年4月5日，林语堂又在上海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该刊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由林语堂撰写的该刊《发刊词》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并指出小品文的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牘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宇宙风》半月刊（后改为旬刊）。该刊在抗战中辗转迁徙、历经磨难。

1936年9月，由黄嘉德、黄嘉音昆仲主办的著名刊物《西风》月刊在上海创刊，林语堂应邀担任该刊“顾问编辑”。林语堂还亲自为该刊创刊号撰写发刊词。也就在这一年，林语堂携家人移居美国，但他仍为《西风》供稿，如《抵美印象》、《中日之国民性》等，同时他还在该刊每期的“长篇连载”专栏发表由他英译的沈复的《浮生六记》。

除办杂志，用中文写作杂文、散文外，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林语堂又开始用英文写作。“五卅”运动之后，上海创办了一份由国民党政府资助的英文报纸《中国评论报》（*The China Critic*）。林语堂1928年用英文写的《鲁迅》一文曾在这家英文报纸上发表。从1930年开始，林语堂成为《中国评论报》的长期撰稿人，不断地为这家英文报纸的“小评论”专栏写稿。据统计，“到1936年为止，共发表160余篇，结集为《小评论选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①。1935年，由孙科所支持的英文月刊《天下》创刊，林语堂为该刊编辑之一，同时也为该刊写过不少文章。此外，美国的《亚洲》、《哈普》等杂志，也是林语堂经常投稿的刊物。

由于林语堂的英文写作和汉译英作品数量渐多，水平渐高，遂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外国报刊及出版商也纷纷向林语堂约稿。1934年前后，美国著名女作家、出版商、小说《大地》（1931年出版，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赛珍珠向林语堂约稿，请他用英文写一部介

^① 万平近：《林语堂生活之路——兼评林语堂的〈八十自叙〉》，见《林语堂自传》，29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绍中国的书。1935年，林语堂应约撰写的《吾国吾民》一书，由赛珍珠及其丈夫主持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是其第一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历史及中国民族的英文著作。该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流传甚广。

1936年8月，在赛珍珠的邀请及资助下，林语堂举家迁美。在此后30年时间里，林语堂在美国撰写了大量的英文著作，其中包括《京华烟云》等长篇小说，《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传记文学作品和《老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古典著作的译作。

在林语堂大量的英语著作中，《中国新闻舆论史》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我国对舆论及舆论学的研究起源比较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梁启超最早提出“舆论之母”、“舆论之仆”的观点（见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又对宣传与舆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发（见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朱执信则对鼓吹、煽动与舆论形成的关系作了更充分的剖析。他写的《舆论与煽动》[载《建设》第1卷1号1919（8）]一文，是我国早期研究舆论学的重要论著。以上有关舆论学的研究都是零星的单篇论述。我国最早对舆论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把新闻史与舆论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专著的，就是林语堂的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了。该书在充分利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和罗文达、白瑞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最早的舆论史学研究专著的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是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最早是用英文写的，从1936年出版以来，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未能被译成中文。王海博士、何洪亮教授两位勇于攻坚，在“吃”透原作（1936年版本）的基础上，花了很大精力和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作了填空补缺的工作，功莫大焉。另外，我们知道，美国最早的舆论学专著是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李普曼（1889—1974）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该书于1922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曾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轰动。直到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林珊老师根据 *Public Opinion* 一书1965年英文版翻译出国内第一个中译本，书名《舆论学》，在国内“内部发行”。1989年，该书才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2002年，由阎克文、江红根据 *Public Opinion* 一书1997年英文版翻译的国内第二个中译本《公众舆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由于林语堂的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译本的出版，使中西方关于舆论学研究的最早的

两部论著全部得以译成中文，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新闻舆论史》有两个版本。即1936年版和1968年版，本书是用前者进行翻译的。但1936年版本中有些引文和注释并不完整和规范，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有的与史实也略有出入，译者只能忠实于原文来翻译。

刘家林

2007年5月1日于暨南大学羊城苑34栋102号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帝国与传播 [加] 哈罗德·伊尼斯
- 传播的偏向 [加] 哈罗德·伊尼斯
-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美] 哈罗德·D·拉斯韦尔
-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美] 新闻自由委员会
- 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 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 [美]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
- 传播与社会影响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 模仿律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 传媒的四种理论 [美] 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
威尔伯·施拉姆
- 传播学简史 [法] 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
-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

策划编辑：司马兰 李学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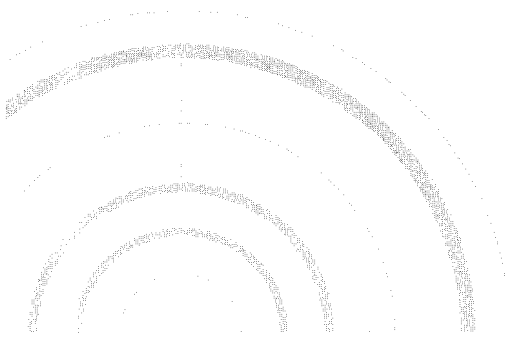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赵建荣 骆 骁

装帧设计：敬人书籍设计

吕敬人+杜晓燕+德浩

版式设计：赵星华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祖籍福建漳州，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报刊活动家，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而享誉海内外。除了《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和《风声鹤唳》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外，林语堂曾先后创办或主编《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著名刊物，其新闻思想集中反映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以及《中国杂志的缺点——〈西风〉发刊词》、《为蚊报辨》等论著中。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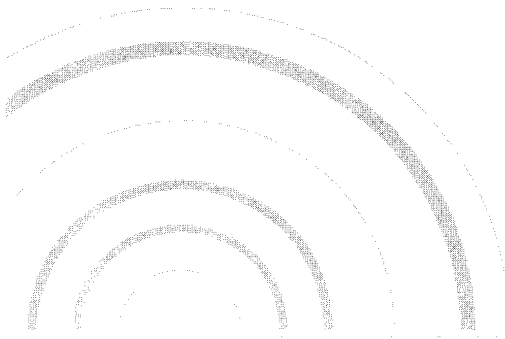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古代时期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报纸 (11)
第三章 古代歌谣 (18)
第四章 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事件 (26)
第五章 魏晋时期的舆论限制 (36)
第六章 宋朝的学潮 (41)
第七章 明朝的宦官、新闻审查和东林党 (51)

第二部分 现代时期

第八章 现代报纸的开端 (1815—1895) (67)
第九章 辛亥革命前的报纸改革 (1895—1911) (83)
第十章 民主共和时期的新闻事业 (1912年
之后) (97)
第十一章 当代新闻事业 (109)
第十二章 当代期刊 (125)

第十三章 新闻审查制度·····	(137)
附录 林语堂年表·····	(148)
译后记·····	(162)



第一章

引 言

像古代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那时中国的民众无报可读。直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而且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报业才成为重要的独立商业组织。现代中国报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在技术层面上，从新闻收集、发布和编辑艺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报业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报刊被视为舆论工具的同时正在走向腐化，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而某些独裁政权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报纸在这方面可能引领着潮流。

这似乎是过于严肃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报刊新闻对我们而言是无意义的或者关系不大，除非我们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报纸的业绩，进而通过以下路径把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真实基础。首先，我们用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为舆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报刊的印刷和发行技能则成为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关注更加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承

担着发布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结果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何种因素促使报业来贩卖、兜售数以千万计的官方的扭曲信息和宣传资料，使成千上万的国民每天在阅读和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上得到大众化的教育，而其中没有表达受伤害群体的感受的声音？尽管报刊的发行量很大，但这对新闻自由却是一种嘲讽，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动物王国可以享用，而人类还远未触及，除非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申诉和抗议的自由。

2 这里，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带有局限性：笔记者往往并非是对事实材料感兴趣的人，除非他们把目光瞄向舆论力量及其如何展现中国民主的根基的问题。这其中又包含着一个原始的准则：一个好政府总是倾听民众的声音，使国家逐步发展壮大，有时还达到兴盛之治；而有时国家却由于当政独裁统治者的腐败而遭受严重的摧残。在这些史料的表象背后，我只是有幸认识到它们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深层意义——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最早的某些历史文献中已陈述过“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经典准则^①，而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模式是，“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②。本人有兴趣观察这条准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它是如何伴随着人类血肉生死的代价而得以争取和捍卫的，以及它是如何受到中国历史上所谓“铁腕”执政者的一贯压制的。换言之，从笔者的考察来看，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

毫无例外，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时期，舆论和当权者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从理论上讲，人们并非总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必定形成任何现实、明智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原则，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立——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它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君主独裁制的政体形式，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拔河式的博弈和较量：假如政府赢了，民众肯定输了，反之亦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以及限制自由和约束当权官员们的各种手段和谋略就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君主独裁制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允许自己在绳子的

^① 《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② 在明朝早期，没有官职的普通学者被朝廷相关部门收录，朝廷鼓励他们向皇上呈送改革奏章和建议。